

讀司馬長風

「中國新文學史」

趙聰

司馬長風先生的新著，「中國新文學史」中卷，今年三月底，已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了。這對於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，應是一個值的歡喜的佳音。

這部書的上卷，早在去年一月出版，銷路甚好。人們讀了上卷，巴不得接着讀到中卷，望眼欲穿等了一年多，現在總算等到了。

上卷從新文學運動開始寫到二十年代之終，中卷從「左翼作家聯盟」的成立寫到抗日戰爭的前夕；前者旨在指出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，後者旨在展現新文學在巔峯狀態的圖景。

關於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，因有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結集——即四十餘年以前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「中國新文學大系」十巨冊，可資參考，寫起來還比較省力——至少要省却一些搜集資料的麻煩。但到寫三十年代的新文學——即這部書的中卷時，那就困難得多了，最重要的一

大陸上的統治者，早就想把五四運動，新文學運動說成是共黨發動的，正是貪天之功以爲己功。

點，就是資料得一點一滴的尋找，搜集資料的時間恐怕要大過寫作的時間很多倍。

在過去，講中國新文學歷史的書幾乎沒有。由於絕大多數新文壇上的老將淹留在大陸，如果你身在寶島而寫史，自然不好提到他們的名字而加以月旦。有幾位躬逢昔日文壇之勝的名作家，如梁實秋、王平陵、謝冰瑩、孫陵、蘇雪林諸先生，偶有回憶當年文壇交游之作問世，亦只可當作一種史料來看，而不是史。最近聽說有新文藝史之出版，但從港報上看到有人指出其錯誤的文字。

中國大陸上的統治者，早就想把五四運動、新文學運動說成是共黨發動的，正是貪天之功以爲己功。所以他們對於新文學史非常重視，在四十年代之末，就擬在大專院校開設這一課程，曾由蔡儀、丁力、李何林等會稿製訂了新文學史教學大綱。後來王瑤、劉授松等人的專書，就是依據大綱編出的講義。可惜他們的政治偏向太厲害了，把黨員作家捧上了天，對非黨作家橫加貶抑，甚至從歷史塗去他們的名字。好比講新文學運動的開創，那就力捧李大釗和魯迅，胡適和陳獨秀倡導之功反遭埋沒；談五四以後的新詩人，僅只郭沫若和蔣光慈，徐志摩則無地位；論三十年代文藝，那就只有「左聯」了。這都不是史，而是一些掩蓋真相的宣傳品。

近年來，香港有些高等院校開了中國新文學史的課程，講授者大都有一個共同的困難，就是缺乏參考資料。舉個例說，評價一位作家，至少要明瞭他的生平和生活的背景，還得讀他的一些主要作品。二、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，在香港就很難找得全，比較流傳得廣的書如巴金的「家」、茅盾的「子夜」、老舍的「駱駝祥子」等等，幾個較大的圖書館裏是有的，但比較不大通行的書如廢名的「橋」、沅君的「菴施」、陳銓的「天問」等等，恐怕連較大的圖書館也不會有。所以，十年前就聽說有很多人

要寫新文學史，筆者也一度有過這種野心，到頭來來還是司馬長風後來居上，他動筆最遲，却先完成了三分之二——上卷是前年三月開筆，七月完成；中卷是去年七月開始到今年二月脫稿。他的速度、毅力和魄力都是驚人的。

一部十五萬、二十萬言的書，能够分別只花費半年、七個月的時間完成，雖然如此快速，却不是急就成章。因為這部書涉及的面够廣，評論也頗有深度；而最可誇的是，決不人云亦云，全屬個人創見。作者在中卷的最後，附有一篇簡短的「跋」，敘述了他的寫作經過，也介紹了這部書的特點，這裏沒有引錄的必要，以下只就筆者讀後的感想，略說一說。

個人覺得這書特點之一，是作者很重視文學思想和理論批評。不但在新文學開創之初，作者介紹了各家的思想理論，並且在以後每一個時期敘述——實際上不單單是敘述，而是含有很大成分的述評——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戲劇完了，必然接着就有一章，專門介紹那個時期的文學批評。在一個特定時代、特定地區的作家，因有共同的感受，在作品中也就顯示出一種共同的趨向；而有着共同趨向的作品所表達的思想，往往很快能够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思潮，這種思潮也必影響着每一位作家。至於文學批評，那更是聯繫作者與讀者的橋樑，批評者無論對作者對讀者都是一大功臣。司馬長風能在這一方面着眼，的確是了不起的一個卓見。西洋文學史每把作家們系於古典主義、浪漫主義、寫實主義、象徵主義之下，就是這個道理；中國的劉彥和之「文心雕龍」、司空圖之「詩品」，和他們同時代的辭賦家、詩人，同被後世重視，也是這個道理。

其次，筆者覺得作者的分期也是一個創造。不加分期，只是順序的鋪敘，那是流

這部書把新文學的歷史，分為五個時期，即誕

生期、成長期、收穫期、凋零期與沉滯期。

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資料中下過一番功夫，就不會寫得出這兩條明晰的界線來。

水帳式的史料的串連。分期不當，抹殺了起承轉合的關鍵性的痕迹，使人看不出文學發展的曲折之所以然。這部書把新文學的歷史，共分為五個時期，即誕生期、成長期、收穫期、凋零期、沉滯期。分期的理由及起訖，已在上卷的導言裏說得很詳細，這裏不再引錄。上卷寫的正是前兩期，而中卷則寫了一個收穫期。最後兩期，當然就放在將來出版的下卷裏了。一、二兩期的分界線，作者定在全國小學國文教材改用白話文的一九二一年。在這以前，只是幾份非純文學的報刊的提倡；在這以後，却已出現了新文學的團體和純文學的期刊，實在是非常顯明。至於二、三兩期的分界線，則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的一九二八年。這年以前，北京的作家紛紛南遷；這年以後，北京改為北平，文學的中心由故都移到上海。也是極為清楚。這一點，令人佩服；不是在浩如烟海的資料中下過一番功夫，就不會看得出這兩條明晰的界線來。

作者把每一期每一類的作家作品，作為附錄詳細列出，是另一值得稱道的工作。這些附錄對於讀者幫助很大，如果想在文學中選一作家或一作品作專題研究，這些附錄就是很好的指引。近幾年來，留學歐美的中國學生，往往選一位新文學作家，撰寫畢業論文。有人曾來函下問到筆者，記得他們是想研究巴金、田漢、老舍的。美國各大學圖書館裏，有些中國新文學作品，但他們苦於不知某一作家有某些作品。我想如果他們看到這部書，搜附錄所列分頭向大學圖書館取借，就省便得多。雖然這些附錄所列，尚不能說已够全面而無遺漏，但大致已差不多，已足够了。

作者批評作品有其獨到的見解。當然，對於文學作品的批評和欣賞，完全是一種主觀，人人未必相同。不過有些大家一致推許或大多數有分量的人讚賞的作品，就往往使人不敢另有異詞，怕被人訕笑不懂作品。對此，作者毫不顧慮，直抒己見。好比

周作人的「小河」一詩，人人誇好，作者大不謂然。多少年來，筆者對於此詩之被稱讚，一直輾轉。今見作者首次冒人之大不韙提出此見，實在深得我心。又如魯迅的「阿Q正傳」、矛盾的「子夜」，這兩位大牌的代表作品，作者都予以嚴格的批評。筆者雖然不完全同意，却認為作者批評的幾點都很合理。至於魯迅的第一篇小說「狂人日記」，作者很推崇，但筆者很不喜歡它以及其他這一類的作品。據知魯迅這部小說的形式，是師取於俄國安特列夫的，安特列夫有這同名的一個短篇，內容自然與魯迅的不同。

作者使筆者最心折的是他注意到別人所忽視的作家，像馮文炳、李劫人、陳銓，都用了很多篇幅來介紹，後二人還列入收穫期七大中長篇作家之中。在小說作家中，筆者最喜歡沈從文和馮文炳（廢名），作者對沈也是推崇備至。馮的作品不大好懂，讀者不多，所以不如沈之出名，但他所寫却值得咀嚼，味道很厚。李劫人的小說，在香港才讀到——那是大陸的重印版本，真正好極了。陳銓在過去筆者只讀過他一個長篇「天問」，至今印象很深，寫的是四川一位軍閥的一生，極富傳奇性。司馬長風能對李、陳有所論列，足見他涉獵之廣，研究之精。

作者寫此書時極為認真，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關於「左聯」成立大會時的出席名單。作者在中卷頁十六列出一個卅九人的名單，這已經是「多方搜羅考察」，得來頗不容易的了。但他在「中華月報」發表了這一章以後，得到美國葛先生來函，供給他那個「左聯」的名單，一為刊在當時蔣光慈主編的「拓荒者」第三號內的，一為國民政府特工檔案的記錄。作者便附錄在這一章的後面。關於「左聯」成立時到會的人數及名單，中共自己都無案可稽。王瑤的「中國新文學史稿」和劉授松的書都沒有記全

作者批評作品有其獨到的見解。當然，對於文學作品的批評和欣賞，完全是一種主觀，人人未必相同。

總之，雖然有此藉口可以搪塞，不過終於顯出了魯迅的小器。

，當時「拓荒者」也只刊出廿九人。特工檔案的四十八人。所謂「五十餘人」之說，當是大約的數目，未必確實。這部書能有這些資料做參考，已是空前的了。不過，據筆者所知，從前見過一些資料，據說當時郁達夫並沒有到會，是魯迅替他簽上的名字。茅盾、郭沫若當時都在日本，也是別人給他們簽的名。又，據夏衍說，當時出席的有潘漠華（湖畔詩社四詩人之一），為安全計，沒有簽名。這樣看來，究竟當時到了多少人，就很難說了。

筆者還佩服作者的細心，在上卷頁一六〇提到沈從文時，他怪責魯迅選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，沒有選上沈的作品，認為「是一嚴重的錯漏」。這是為許多人所忽略的事，今經作者指出，始知魯迅確有不公之處。魯迅和陳源（通伯、西滄）不睦，在北京打過幾年的筆仗。陳太太凌叔華寫的「花之寺」，魯迅這方面有人指責，說她抄襲契訶夫；魯迅寫的「中國小說史略」，陳源這方面也有人指出是抄襲塩谷溫。就是這樣互相攻擊，一直不能融洽。但到了魯迅選大系小說二集時，却仍然選入凌叔華的小說，並在「導言」中予以美評。又，馮沅君以「淦女士」的筆名在「創造週報」發表了幾篇小說，創造社和魯迅也是死對頭，可是馮沅君輯印那幾個短篇出單行本時，魯迅仍然給她寫序文，非常讚許。不想對沈從文，魯迅竟然計較起來了。新月社和魯迅更有難解的仇怨，沈從文那時多在「新月」上發表作品，魯迅曾嚴酷地批評過他；再說那時沈不過初生之犢，尚無單行本問世（大系只選到一九二七），也還未享大名，魯迅索興就不理了。總之，雖然有此藉口可以搪塞，不過終於顯出了魯迅小器。

在筆者讀過的這類著作中，個人以為司馬長風之作應是最好的一部，晚了，願祝作者健康，早日動筆寫出下卷。